

無神論鼻祖達爾文 之歷史地位 (二)

吳家望

(續上期)上文我們開始從政治經濟和哲學信仰的角度探討達爾文對人類歷史的深遠影響。我們談到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On Population)對達爾文的深刻影響，以及達爾文學說對馬克思主義(Marxism)和高爾頓(Francis Galton)人種「優生學」(Eugenics)的影響。

從英國到美國

高爾頓以達爾文之科學理論為後盾，「引入國家之良心」為號召，立竿見影，得到全世界的社會、政治領袖們響應。早在1882年，美國通過臨時排華法案，禁止華人勞工移民加州，並廢除華人移民既有的公民權利；1902年，該臨時法案更成為永久法律。從1898年起，以著名美國生物學家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為首的科學界將優生學之「科學觀念」推廣，成為席卷世界的風潮。一方面，達文波特得到鋼鐵大王卡內

基(Carnegie)財團支持，建立了優生學的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生物實驗站(1904)以及美國優生學資料中心(1910)；另一方面，他積極參與國際優生學組織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Eugenics Organisations, IFEO)活動，並於1925年擔任主席。為了純化人種，達文波特主張「限制移民」和「強制絕育」兩種措施。當時，美國主要科學和醫學組織，包括國家科學院，都支持優生學。在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的支持下，從1907年印第安納州開始，30多個州都通過了(非自願)義務絕育的法律(compulsory sterilization)，此法律更在1927年得到美國最高法院認可。(Black, 22, 34, 40, 47, 120-121, 240)

著名作家布萊克(Edwin Black)走遍世界，研究優生學資料和歷史，寫了一本名叫《反弱者之戰》(War Against the Weak)的書。他總結說，二十世紀的前60年，數十萬美國百姓因為祖先、國籍、種族和宗教等種種理由被禁止生育，政府運

用權力強制節育、禁止婚嫁和強行把人禁閉於精神病院。他說，參與這種肅清種族戰役的不是拿槍枝的軍隊，而是帶白手套的知名教授、尖端的高等學府、富有的企業家和高級官員；他們聯合推行假冒科學的種族優生主義，以達到一個創造超級的日爾曼(Nordic)民族的目的。(Black, xv)

美國是一個靠從貧窮世界輸入奴隸來作苦力起家的、種族複雜的國家，也承繼了英國的種族優劣標準。但是，現代美國以道德高超自居，很多人不願意接受布萊克的結論。美國的種族問題不是本文的主題，以下報導只是一個最近發生的小插曲。冷泉港多年來一直是「從優生到基因」(From eugenics to genetics)的重要研究中心。1968年，發現DNA結構的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生物學家華森(James Watson)出任主管，1994年升任主席，在該機構工作先後共40年。華森積極支援基因檢驗(genetic screening)和基因改造(genetic engineering)，認為愚笨是一種疾病。2007年10月，80歲的華森離開冷泉港，不是光榮退休，而是低頭辭職，因為華森認為黑人智力低於白人。他曾在接見英國《星期日時報》記者時說，非洲的前途黯淡無光，因為我們的社會政策是建立在與(科學)實驗結果恰恰相反的、「他們的智慧和我們相同」的基礎上。華森的高調即刻傳遍全球，沒有一個學府再願意接納他為講員，從此華森一蹶不振。到末了，他至高榮譽也蓋不住他內心深處的偏見。(媒界頭條新聞，參考K.Wigglesworth, "DNA pioneer quits after race comments," *L.A. Times*, October 26, 2007)。

從美國到德國

德國生物學家普勒滋(Alfred Ploetz)少年時就追隨黑克爾，1905年創立了世界最早以達爾文主義為基礎的優生學組織，名叫德國「種族純潔協會」(Race Hygiene Society)，並出版優生學刊物(Weikart, 15)。他說，他創用「種族純潔」一詞的意義是，雅利安民族(Aryan，印歐語系、北歐日爾曼人)的純潔和整個人類種族的純潔息息相關；除了包括猶太人的一些少數種族外，雅利

安民族代表最開化的文明種族；促進雅利安民族就等於促進全人類。1907年他又成立了一個更為激進的秘密組織「日爾曼圈」(Nordic Ring)。他說，「日爾曼圈」唯一的方向和努力目標乃是純淨的日爾曼 德意志種族(Weikart, 118)。

當有系統的優生學之火炬從美國傳到德國時，也正是希特勒(Hitle)高舉「種族純潔」(racial hygiene)旗幟、純化雅利安民族的時期。當時德國的優生學研究機構「大腦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得到美國洛克菲勒(Rockefeller)財團慷慨支持。1927年，著名的美國國際商業計算機公司(IBM)成功為冷泉港設計了優生學調查鑒別人口的打洞卡片(punch cards)。1932年，在卡內基和洛克菲勒財團支持下，IBM為希特勒設計了德國種族歧視和迫害猶太人的追蹤設備(Black, 288-291)。同年，著名德國優生學家、德國「種族潔淨」協會的創辦人魯定(Rudin)，接替美國的達文波特出任國際優生學組織聯盟(IFEO)主席(Black, 285)。優生學說是德國「優越民族」擴張野心的思想基礎，並且青出於藍，德國自1930開始推行強制節育政策。從1934到1937年，被強行絕育手術的、政府認為精神上或身體上不「適應」(unfit)的有40萬人(Proctor, 108-109)。納粹政府更進一步，推行所謂「安死」(euthanasia)活動，屠殺7萬殘疾病人(Weicker, 225-226)。從1933年到1945年，希特勒政權有計劃地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史稱「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幾乎實現了希特勒要滅絕所有歐洲猶太人的計劃(Kuntz, 2004)。

現代「安死學」(Euthanasia，或譯安樂死)專家舒目爾(Hans-Walther Schmuhl)指出，「達爾文主義理論抹殺了人擁有上帝形像的觀念，生命失去了它的自然尊貴，人的性命降低為一件物品(property)，只能用來和其他物品品評比較。」(Weikart, 146)顯然，達爾文主義為希特勒的擴張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現代歷史學家韋卡(Richard Weikart)指出希特勒之所以危險，是因為他的政策和決斷都是以一致的、有毒的道德觀念為基礎(Weikart, 209)。

希特勒之道德觀念的基礎，既非傳統的猶太 基督教道德觀念，亦非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誠命(categorical imperative)，而是斷絕傳統，背道而行。希特勒信奉的，是一種以達爾文主義的「健康和適應」(health and fitness)為唯一道德標準的進化論倫理(evolutionary ethic)。希特勒明目張膽地宣稱：「歷史讓我們看到，如果沒有強大勢力為後盾，權利(right)本身毫無用處。如果人沒有權力來實施他的權利(impose his right)，他的權利豈非枉然。強者永遠是勝者 整個大自然是強勢和軟弱之間的不斷鬥爭，強者不斷征服弱者。」(Weikart, 210)韋卡說，達爾文主義本身沒有產生納粹(排猶)的大屠殺，但是，如果沒有達爾文主義，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之延伸，希特勒或他的納粹跟隨者就不可能打著科學的旗幟，來說服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夥伴說，此一世界上少見的殘酷大屠殺在道義上竟然是值得頌讚的。(Weikart, 233)

從德國到全世界

二次大戰以後的事不能算是歷史，是我們這一輩和上一輩的親身經歷。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不用說了，對中國人來說，達爾文的年代也就是鴉片戰爭的年代。中國人經受的種族歧視，包括「先進」國家對「東亞病夫」的侮辱，更是司空見慣。我們父輩還記得上海外灘公園門口掛著的「犬與華人不准進入」的金牌。免得離題遠了，還是回頭來談「適者生存」和優生學的繼往開來吧！

中文用「適者生存」來翻譯達爾文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似乎過於溫和，沒能表達達爾文主義的強烈含義。Fittest的意義是最健康、最強悍者，Survival的意思是僥倖存活，死裡逃生。達爾文本人形容大自然的作為是「如此地笨拙、浪費、錯亂和恐怖的殘酷(horridly cruel)，好像是一本魔鬼的牧者(Devil's Chaplain)所寫的書」。(Darwin, 1856)

其實，現代科學家對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價值，特別是「適者生存」的說法，頗有異議。50

年前，達爾文《物種起源》出版100年時，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曾評論「適者生存」的意義。遺傳學家摩根(T. H. Morgan)說：「『適者生存』理論是自圓其說(a truism)，它只不過是說，適應能力最強者比缺乏適應能力者有較好的生存的機會而已。」摩根進一步說：「(自然)選擇不曾產生任何新種類，只不過是產生更多同類(後代)而已。」遺傳學家馬勒(Hermann Muller)在談論自然選擇時說，如果沒有這種選擇，「所有的變異照樣得以保留和繁衍，生物照常向較高型態發展」。(Bethell, 88, 90)說穿了，「適者生存」並不是甚麼科學理論。

最近這幾十年，科學上的發展史無先例的突飛猛進，從太空物理學的宇宙大爆發論到DNA結構，從前無法解釋的，現在都能夠解釋，而現在能夠解釋的卻帶出更難解釋或永遠不可能解釋的問題。儘管如此，科學界的達爾文主義者似乎著了魔，認為進化論是唯一可以解釋一切的法寶，連與「適者生存」毫不相干的宇宙學也得符合達爾文主義的法規。現代最時髦的學科有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宇宙達爾文主義(Cosmology)、文化達爾文主義(Cultural Darwinism)、文學達爾文主義(Literary Darwinism)和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l Psychology)等等。

在遺傳學領域，Eugenics「進化」為Genetics(遺傳學)，再進入Newgenics(新優生學)。1969年，《優生學》季刊改名為《社會生物學》；近年來，「社會生物學」又改稱為「進化心理學」。1978年，世界第一位試管嬰兒(test-tube baby)誕生，今天，體外受精已是家常便飯。1960年代初，(我們剛才提到的)遺傳學家馬勒建議從智力和藝術天份高的男人搜集精子，然後物色聰明和健康的婦女來領受。馬勒死後，1971年「馬勒胚種選擇貯藏庫」(Hermann J. Muller Repository for Germinal Choice，俗稱「天才精子庫」Genius Sperm Bank)正式成立，專門收藏諾貝爾獎得主的精子(Mendelsohn, 2000)。1997年，第一頭克隆複製的綿羊問世，今天，基因改

造(genetic engineering)的克隆技術精益求精，第一個克隆嬰兒(human clone)出現是遲早的事。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門德爾松(Everett Mendelsohn)在2000年發表了一篇意味深長的文章，題名為「當道德落後於科技時優生學之誘惑」。他說，科學界解決問題是從知識到應用，勇往直前；但是我們處理道德和社會問題卻只憑興之所至，散亂而無焦點。他更說，從前原子物理學家先解決「甜蜜的技术」問題，到最後要付代價，回頭對付所帶來的道德和社會問題。他希望現代的科學家不要重蹈覆轍(Mendelsohn, 2000)。研究優生學歷史的專家布萊克認為，那「創造一個超級民族」(to create a master race)的宿願會否死灰復燃，誰也沒法預料。然而，在二十一世紀中，決定誰佔優勢、誰會興旺的力量，不是種族、宗教或國籍，而是經濟。他認為，這種「新優生學」(Newgenics)帶來的全球合夥的科學革命，會促進逐漸的、以基因為基礎的、經濟上的兩極分化(disenfranchisement)，而產生一個無保障、無就業機會、無經濟來源的基因低下階級(genetic underclass, Black, 428-429)。

小結

2006年，英國達爾文基金會召集世界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來討論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前景，美國著名《科學雜誌》(Science)以「四季皆宜的達爾文」為題報導會議內容。會眾支持著名無神論哲學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所謂達爾文主義乃是(能夠融化一切金屬的)萬能酸(universal acid)的說法。專家們認為，達爾文主義在遺傳學和數學模型學(mathematical modeling)上已有肯定的根基，但警告說，在二十一世紀，如果有少數生物學家不照著達爾文的腳步走(not walk in Darwin's steps)，生物學就一無指望了。即使在遺傳學上，科學家也完全不知道基因密碼的來源，不懂得第一個細胞怎樣出現，不知道(遺傳單位)「複製體」(replicator)的起源。這些科學家認為，達爾文主義不應該被局限於生物界，下一步要把希望寄託於達爾文主義在化學界的突破，再下一

步則是文化領域。(Szathmáry, 2006)

今天我們回顧200年來達爾文主義在世界政治舞台所興起的巨浪，想到達爾文主義要進軍心理和文化領域，要在他們的瓊樓玉宇上起舞弄清影(借用蘇東坡詞句)，確實令人有點高處不勝寒之感。

參考資料：

Edwin Black(2003), *War Against the Weak: Eugenics and America's Campaign to Create A Master Race*,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Tom Bethell (1998), "Darwin's Mistake," in *Philosophy of Biology*, Edited by Michael Ruse, Prometheus Books.

Charles Darwin (1856), "Letter to J. D. Hooker," 13 July, 1856, *Darwin Project Letter No.1924*, <http://www.darwinproject.ac.uk>.

Dieter Kuntz (2004), editor, *Deadly medicine: creating the master rac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online exhibit: <http://www.ushmm.org/museum/exhibit/online/deadlymedicine/>).

Everett Mendelsohn (2000), "The Eugenic Temptation, When ethics lag behind technology," *Harvard Magazine*, March-April 2000.

Robert Proctor (1988),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Harvard University.

Eörs Szathmáry (2006), "EVOLUTION: Darwin for All Seasons," *Science Magazine*, 21 July, 2006.

Richard Weikart (2004), *From Darwin to Hitler - Evolutionary Ethics, Eugenics, and Racism in Germany*, Mcmillan.

